

旧方志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何沛东

提 要：旧方志地图是中国古旧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深入，旧方志地图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成绩，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史和总体特征的概述、作者与编绘研究、内容与思想性研究、区域方志地图研究和方志地图的分类研究、方志地图的整理等方面。进行旧方志地图的分区域整理与研究、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与使用研究、旧方志地图的对比研究、学术研究中加强旧方志地图的利用等是今后研究旧方志地图需要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方志地图 研究成果 研究展望

引 言

方志，即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地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的书籍，常被称为“一方之百科全书”。“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①的思想在我国长期流传，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持续不断的编修方志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等阶段，至宋代其体例逐渐定型，方志附图的通例大约是源于图经的传统。^②方志所附地图是对方志内容的再现和补充，与方志中的文字叙述“虚实相资，详略互见”^③，地方官阅图可知其辖区的地理形势与民情风俗，达到按图施政、按地施治的效果。^④

方志所附的地图具有一些独特的表征，许多学者习惯将方志中的地图称为“方志地图”“方志舆图”“志书地图”等，如“方志地图是一种特有的专门地图，它是地图和方志最古老的表现形式”^⑤；“中国古代地方志书中的雕版刊印或手摹地图，本文命之为‘志书地图’”^⑥；“方志舆图是中国特色的一类文献——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志中，舆图是表示方志所记的地域的地表诸多事象的图的总称”^⑦等。又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方志所附的地图时，虽未对其进行定义，但在行文中自然地运用了“方志地图”“方志舆图”等名词^⑧，这些莫不昭示着研究者对“方志地图”及其“方志所附地图”含义的认同。笔者认为，不妨将“方志地图”定义为附于地方志中的，使用印刷、手工摹绘等技术制作的，记录区域地表事象的所有地图的总称。^⑨

海野一隆认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大型且精细的地图制作数量少，新旧更替时旧地图又常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旧方志海图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CZS011）阶段性成果。

- ① 嘉靖《山西通志》卷首杨宗气《序》，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中华书局，2017年影印本，卷首第2页。
- ② 参见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0—171页。
-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3页。
- ④ 参见史五一：《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广西地方志》2009年第1期。
- ⑤ 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 ⑥ 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⑦ 于风军：《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陕西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
- ⑧ 参见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况》，《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潘晟：《地图的作者及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龚纓晏：《象山旧方志上的地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 ⑨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暂用“旧方志地图”指代1949年之前出版的旧方志所附地图。

被废弃,因而这种地图很难流传下来;相反小型、内容简略的地图,多数人均可模仿传抄,所以相对容易保存下来,他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粗存精亡”。^①“正是地图流传过程中存在着‘精亡粗存’现象,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古地图多半是收藏在方志中的”^②,但过去学界对于旧方志地图的看法多是“既粗糙又无图例、比例尺,参考价值甚低”^③。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地图学史等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旧方志地图的价值,旧方志地图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呈现出多学科交叉与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④,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旧方志地图研究回顾

(一) 旧方志地图的发展史与总体特征概述。方志地图与方志相伴而生,对于方志的起源问题学界意见不一,具体者如《山海经》《周官》《禹贡》《越绝书》《华阳国志》《娄地记》等,泛言者如两汉“地记”、魏晋唐宋“图经”等。据传《山海经》中原有“山海图”,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为最早的方志形态,自然他们亦将其所附的“山海图”作为方志地图的起源。^⑤魏晋至北宋时期的图经是中国地方志发展的重要形式,王庸、陈桥驿则认为方志附图的通例大约是源于图经。^⑥唐雅芝依照方志地图的发展特点,将其发展分为3个阶段:秦汉之前的古方志地图时期,图的示意性主观性强、内容简单、形状位置失真;晋唐至民国末年的旧方志地图时期,采用制图理论、数学精度增强、内容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方志地图时期,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地图的科学性最强。^⑦邱新立认为从制图方法方面很难划分方志地图的发展时段,他从地图在方志中地位的变化入手,进一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方志地图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至秦汉,图为主经为辅;六朝后期至唐宋,图、经并重但图的地位开始降低;南宋至清末,图文并茂但图已成文字的附庸。^⑧“图经”发展至宋代开始由盛转衰,南宋时期方志体例趋于定型,王旭认为宋代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减弱,方志编修逐渐由地方官绅掌控,地图类型以符合地方官绅的愿景为主,此即宋代方志中地图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⑨至于旧方志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再聪等明确指出,从西晋开始,中国地图测绘开始分为国家舆地图测绘和方志地图绘制两个系统,并以《安西采访底本》所附地图为例,说明直到清末方志地图依然延续着自身的绘制传统。^⑩

由于旧方志地图的数量巨大,对于其特征的研究多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从个案中折射出普遍规律,如曹婉如对《严州图经》中地图的内容和文字进行详细对比,发现图经中的经

① 参见[日]海野一隆著,王妙发译:《地图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 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

③ 谢维伦:《以图观史——晚清台湾方志地图与涉外事件》,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 参见潘晟:《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

⑤ 参见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况》,《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王丹林:《〈山海经〉是最早的“图经”和“山志”》,《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

⑥ 参见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0—171页;陈桥驿:《〈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2期。

⑦ 参见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⑧ 参见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

⑨ 参见王旭:《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⑩ 参见刘再聪、李亚栋:《“图”“画”说史:方志地图与国家舆地图绘制方法的分流及回流——以〈安西采访底本〉附图为中心》,《西夏研究》2014年第1期。

文并非地图的文字说明。^① 苏品红则采用抽样分析的方法,从现存旧方志地图中抽取样本对旧方志地图的数量、质量、种类、空间分布等做全面梳理,认为旧方志地图绘制粗劣、种类稀少等缺点使它们并未达到修志者所期望的效果,但其资料价值和地图学价值不可忽视。^② 刘廷祥^③、赖弘文^④、杨彬镛^⑤、刘平平^⑥、李信明^⑦、张安东^⑧、史五一^⑨、高文娟^⑩、李园园和杨中曦^⑪等对某时段、某区域旧方志地图的概况进行述评,典型的如:张哲嘉认为明代方志地图内容较宋元方志地图简略,地图以官府、儒学等政治文化景观为中心,不注重表现地图中所绘地区的幅员形状、内容和地区的差异性^⑫;张俊贤认为清代方志地图的写意形式和不准确性在有意凸显某种目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地图应有的功能而成为文字的附庸,方志中的地图和文字都成为表达清代统治者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⑬

(二) 旧方志地图的作者与编绘。旧方志地图的作者是谁,他们的身份如何?在旧方志编修过程中,地图作者和方志编修者对方志地图产生什么样的认知、对方志地图的改进等方面提出何种见解?潘晟较早对此问题做了探讨,为旧方志地图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他梳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方志地图作者情况,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多非专业地理学者或地图学者,而是一般儒士和工匠。^⑭ 一些学者在阐释方志理论时可能会对对方志地图的编绘产生见解,史五一^⑮、刘克明^⑯对明清方志编修者的地图学思想进行了概述。个案分析典型的如:章学诚对方志地图的认知功能和资治作用有较清晰的认识,刘克明认为章学诚的地图学思想对近代中国地图学史和方志地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⑰;郭象升所作《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地图学理论,他主张采用近代测绘技术,吸取近代地理学的成果来绘制方志地图,但在

- ① 参见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 ② 参见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天津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3期。
- ③ 参见刘廷祥:《我国方志地图的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图为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
- ④ 参见赖弘文:《清代方志地图的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 ⑤ 参见杨彬镛:《宋代浙江的方志地图》,《中国测绘报》2002年5月24日,第3版;杨彬镛:《元明清方志地图》,《中国测绘报》2002年6月7日,第3版;杨彬镛:《民国时期浙江方志地图》,《中国测绘报》2002年8月9日,第3版。
- ⑥ 参见刘平平:《浙江古代方志地图文献考》,《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1期。
- ⑦ 参见李信明:《民国时期的辽宁方志地图》,《中国测绘报》2004年12月17日;李信明:《清代辽宁方志地图》,《中国测绘报》2005年8月5日。
- ⑧ 参见张安东:《清代安徽方志舆图之解读》,《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 ⑨ 参见史五一:《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广西地方志》2009年第1期。
- ⑩ 参见高文娟:《宋代以前的方志舆图述略》,《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19期。
- ⑪ 参见李园园、杨中曦:《明清海南方志地图初探》,《青春岁月》2014年4月上。
- ⑫ 参见张哲嘉:《明代方志的地图》,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79—212页。
- ⑬ 参见张俊贤:《清代地方志中的地图与文字》,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⑭ 参见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潘晟还指导研究生以《中国地方志集成》为样本对清代方志地图的作者进行考察(刘高伟:《清代方志地图作者初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8年硕士论文)。
- ⑮ 参见史五一:《明清时期方志中的图学思想简述》,《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
- ⑯ 参见刘克明:《明代方志中的图学思想》,《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7期。
- ⑰ 参见刘克明:《章学诚方志图学思想探述》,《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0期。

城镇图的绘制理论方面显得不足。^①晚清至民国时期,方志地图绘制受到西方科学技术影响,在内容选择上更加多元实用,绘图者也具有专业素养,地图中的数学要素有所增加^②,有学者认为章学诚、邹汉勋、邹伯奇以及《遵义新志》的地图绘制者都为推动方志地图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③

以往的地图学史研究中,地图的科学性准确性多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以科技史的视角对地图绘制进行检视,从中提炼出技术进步的线索,即孙靖国所谓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科学取径”^④。旧方志地图多数绘法比较“粗糙”,但亦有一部分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绘制技术,胡邦波选取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万历《永安县志》和万历《惠州府志》中采用“计里画方”之法的地图,以定量分析方法探讨4部方志中地图的编绘及内容,肯定其中所包含的“数学要素”及其“科学性”,可谓旧方志地图“科学性”研究的代表。^⑤由于记录地图绘制过程资料缺失,“归纳法”成为探究旧方志地图绘制的主要方法,阙维民较早运用现代地图学知识,对旧方志地图的方位、比例尺、图式符号等作初步分析,归纳出“经营位置”是古代志书地图的主要编绘准则^⑥;汪前进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例详细论证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数据来源(方向、里程)和极坐标投影的方法,为旧方志地图绘制的探讨提供了思路^⑦;潘晟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的方志地图为例,总结出明代方志地图的主要编绘方式有依据旧志图、地方舆图、历史地图集等旧地图资料编绘和依据野外调查、实地勘测、口述资料等重新绘制两种^⑧;于风军考察道光《紫阳县志》中31幅地图的方向,归纳出它们遵循了“高为上或山为上”的地图方向处理原则,但是这种情况较少,不具有普遍性。^⑨

(三)旧方志地图的内容与思想性、艺术性。地图内容的丰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价值和实用性,即所谓的“凡图愈详则用愈广”^⑩。中国旧方志地图中有一类属“形势图”,“只表现大势,求势而不拘细节,且大势必有夸张”,此种地图并非实用图其内容也不详细^⑪,而如防卫图、水利图等类型的旧方志地图内容一般较为详尽。旧方志地图内容的考证以汤开建《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为代表,他通过对图中内容的分析和考证认为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所纪澳门史地之精细,为诸澳门图不及也”,

① 参见张慧芝:《郭象升与山西方志图编绘的近代转型》,《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6期。

② 参见王慧:《从画到图:方志地图的近代化》,《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1期。

③ 参见丁是丁:《推动方志地图进步的先行者》,《地图》2018年第4期;李薇:《成此图以为天下法——浅论邹伯奇与同治〈南海县志〉的舆图测绘》,《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1期;李薇:《浅论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2期。

④ 孙靖国:《20世纪以来的中国地图史研究进展和几点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

⑤ 参见胡邦波:《景定〈建康志〉中的地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9—80页;胡邦波:《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1—106页;胡邦波:《万历永安县志和惠州府志中的地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2—95页。

⑥ 参见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⑦ 参见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⑧ 参见潘晟:《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⑨ 参见于风军:《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

⑩ 光绪《宁海县志》卷首《宁海县分图·图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⑪ 参见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中国学术》2000年第4期。

图中许多澳门地名都是首次在中国地图中出现,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清代澳门城市发展的脉络^①;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是“中国古地图中第一幅以描绘画形式详细绘制澳门地理及建筑的澳门地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旧方志地图内容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图。化名为“城市笔记人”的学者通过对明《辽东志》中《金州山川地理图》的解读,提出旧方志地图对于地貌的呈现涉及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倡导研究者回归到历史语境下看待这些地图,并认清它们的价值。^③近年来“以图证史”在史学界颇为流行,旧方志地图在数量、分布等方面具有优势,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谢维伦结合方志编修的历史背景和志书的文字记载,探讨旧方志地图背后的时空意义,以方志地图为线索对晚清时期台湾地区的海战攻防、炮台建设、清丈工作进行研究。^④类似的研究还有王颖、杜鹃《〈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⑤、王毅《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⑥、唐有伯《广州湾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⑦等。

地图不仅是地理现象的记录与反映,同时也是权力的延伸与构筑想象的空间。方志编纂多由官方主持,反映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体现社会主导思想^⑧,旧方志地图绘制和内容选取也难免会受到政治考量或文化意识的影响。^⑨一些学者通过对旧方志地图的分析,揭示其中包含的文化、观念、思想、艺术等因素。较早从文化对方志地图进行解读的是美国学者范德(Edward L. Farmer),他通过对明代典型方志地图的分析,试图说明地图表现的主要内容是方志编修者所关注和预设的,其目的是向读者展示一个以等级制度安排的秩序井然的世界。^⑩一些明代方志城图重点绘出官署、城隍庙、粮仓和学校,葛兆光认为这是统治者、地方士绅主要关注点及统治手段在方志地图中的体现。^⑪潘晟认为旧方志地图体现了国家、地方官府和文人的思想意向,但方志编修者更多强调地图的政治功能。^⑫洪健荣更是揭示方志地图中渗透的方志编修者的经世理念、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认为清代台湾方志地图是知识建构权利意识相间的场所。^⑬徐博凯则以“植被”“海洋”“山脉”3种方志地图符号来论证符号中所蕴含的政治角力,提出旧方志地图的政治性有2种层次,一种是方便行政管理,另一种是便于中央塑造地方形象,并认为台湾方志地图所蕴含的第二种意图更为强烈。^⑭易田慧从美学和艺术学的视角分析明代方志地图的图形

① 参见汤开健:《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② 参见汤开健:《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③ 参见城市笔记人:《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建筑师》2010年第3期。

④ 参见谢维伦:《以图观史——晚清台湾方志地图与涉外事件》,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 参见王颖、杜鹃:《〈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⑥ 参见王毅:《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⑦ 参见唐有伯:《广州湾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⑧ 参见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⑨ 参见[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83页。

⑩ 参见[美]范德(Edward L. 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⑪ 参见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⑫ 参见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⑬ 参见洪健荣:《知识、权利的空间——清代台湾方志舆图中的政治文化意识》,《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⑭ 参见徐博凯:《帝国文化逻辑的展演——清代台湾方志之空间书写与地理政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符号、图底处理和排版组合、文字等所蕴含的艺术性,认为古代方志地图实现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具有实用艺术的一般特征,其“创作方法、形象、艺术语言、欣赏方法与过程有明显的自身特点”^①。

(四) 区域旧方志地图研究和旧方志地图的分类研究。地域性是地方志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作为地方志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地图也有较明显的地域性表现,如北方地区方志地图中有沙漠、长城等标注,沿海地区方志中附有海防图、岛屿图、海塘图等。于风军较早开展了方志地图的区域研究,他以陕西旧方志地图为研究对象,对方志地图所表现的历史景观加以复原、对比和解读,分析旧方志地图中的历史景观及其成因,进行景观历史地理理论的构建。他认为方志地图中的历史景观是地图绘制者主观意识和客观历史景观的综合体、是历史景观的表象与绘制者对表象内在属性认知的统一、是静态历史景观与动态历史景观的统一、是历史景观个体与整体的统一,对方志地图中历史景观的探讨就是客观历史景观的复原过程和历史人文空间的构建过程;方志地图符号所反映的历史景观实质上是人类历史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互动关系。^② 龚纓晏梳理现存历代象山县地方志所附的121幅地图,重点对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与地位;底图来源、县域中心的改变、国家海防政策的转变、地方经济发展与聚落变迁等因素对地图数量和内容的变化、上图地物选择产生的影响;南田岛的开禁及其在地图上的反映等。^③ 董枫对明清泰顺县方志中的4幅县境图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地图记载内容的差异与绘图者地理认知的关系,认为方志地图只反映了一部分的地理认知,绘制目的和服务人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地图的地理描绘。^④ 类似的还有闫玉玲对清代新疆方志地图的研究^⑤、孙健对同治《巴县志》新旧舆图的研究等。^⑥

旧方志地图有很多种类,既有境域图、城池图、衙署图等常见地图,又有历史沿革图、边海防图、水利工程图、交通运输图等专门地图,为地图分类研究提供了便利。龚纓晏、马先红以浙江图书馆藏《南田记略》中的南田岛地图为例对中国古代海岛地图进行探讨,认为其具有几个特点:官府十分重视海岛地图的绘制;多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技法;缺乏数学要素;文字注释地位重要。^⑦ 何沛东通过对清代《嘉兴府志》所附的海防图和清代《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的分析,认为清代方志海防图的价值并不逊于同时期其他海防图^⑧,海防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方志海图出现“越境而绘”的现象。^⑨ 目前学界对于方志城池图研究和利用的成果较为丰富,如曾新认为旧方志城图在准确复原城市区位、系统认识城市整体自然环境、研究城市形制和境域

① 易田慧:《明代方志地图艺术性初探》,《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年第8期。

② 参见于风军:《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陕西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 参见龚纓晏:《象山旧方志上的地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 参见董枫:《明清县域地图与地方地理认知——以明清之际泰顺县地图的分析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⑤ 参见闫玉玲:《清代新疆方志地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⑥ 参见孙健:《同治〈巴县志〉新旧舆图差异背后的现实性因素分析》,《三峡论坛》2014年第4期。

⑦ 参见龚纓晏、马先红:《中国古代海岛地图的若干特点——浙江图书馆所藏〈南田记略〉中海岛地图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⑧ 参见何沛东:《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述——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海洋史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⑨ 参见何沛东:《方志海图的“越境而书”——以清代〈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3期。

变迁、考订城市布局及道路变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①；他还利用广州旧方志城图勾勒出广州城的变迁过程，对省、府、县方志中的广州城图加以对比分析，探讨广州城图的绘制及发展轨迹。^②侯卫东和罗艳春以后世留存的旧方志城图为线索，复原元代巩义县城的布局和梳理了万载县城的变迁史。^③一些学者还从建筑史、城市规划角度，通过解析旧方志城图，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意象等进行考证，如颜敏杰《运用方志图版解析明清地方城市空间结构》^④、谢鸿权《嘉靖〈陕西通志〉城市建置图三题》^⑤、阴劼等《方志城池图中的中国古代城市意象研究——以清代浙江省地方志为例》^⑥等。

（五）旧方志地图整理。旧方志地图整理是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的前提条件，然而旧方志地图数量巨大、收藏分散、版本复杂等特点为旧方志地图的整理工作造成了较大困难，因此现阶段此类作品相对较少。黄燕生分别考证了《雍录》《严州图经》等9部宋代方志和《长安图志》《至正金陵志》2部元代方志的地图^⑦，为旧方志地图辑佚作品的代表。一些旧方志地图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会被人为“忽略”，如宣统《盐井乡土志》本附有《盐井全图》一幅，但相关论著和书目提要却未提及，赵心愚认为《盐井全图》被忽视的原因与20世纪70年代的油印本无图有关^⑧，这也提醒使用者对于旧方志地图要慎于查找与甄别。近来，徐超以嘉靖《海宁县志》中地图为例，提出以通过注记、绘图及版式三方面来对方志地图进行版本考订和校勘^⑨，对研究旧方志地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刘昕、刘志盛编著的《湖南方志图汇编》^⑩一书从湖南历代方志中选出所属各府、州、县、厅的地图、风景图、星象图等4000余幅进行影印，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遗憾的是，书中所选取的方志地图版本不佳，一些地图中文字、符号较为模糊难以辨别。旧方志地图汇编还有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江苏历代方志地图选》^⑪，选取江苏省360余页疆域图影印出版，地图的清晰度和质量相较于《湖南方志图汇编》有很大进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建设有“Ming Gazetteer Images”，网址为：<http://umedia.lib.umn.edu/taxonomy/term/725>，此数据库将已影印出版的中国明代方志中所附地图进行扫描，为我们研究明代方志地图提供了方便，

- ① 参见曾新：《旧志古城图在复原古代城市历史面貌中的作用——以古代广州城地图为例》，《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8期。
- ② 参见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的城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 ③ 参见侯卫东：《元〈河南志〉巩县城池图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罗艳春：《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中国社会经济史》2015年第2期。
- ④ 参见颜敏杰：《运用方志图版解析明清地方城市空间结构》，（台湾）“中国技术学院建筑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
- ⑤ 参见谢鸿权：《嘉靖〈陕西通志〉城市建置图三题》，《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六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
- ⑥ 参见阴劼等：《方志城池图中的中国古代城市意象研究——以清代浙江省地方志为例》，《城市规划》2016年第2期。
- ⑦ 参见黄燕生：《宋代版刻地图考录》，《文献》1985年第2期；黄燕生：《元代版刻地图考录》，《文献》1987年第2期。
- ⑧ 参见赵心愚：《宣统〈盐井乡土志〉的“图”及其绘制特点与价值》，《民族学刊》2014年第1期。
- ⑨ 参见徐超：《嘉靖〈海宁县志〉舆图初探——兼谈方志舆图的版本与校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 ⑩ 参见刘昕、刘志盛：《湖南方志图汇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
- ⑪ 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苏历代方志地图选》，凤凰出版社，2015年。

但其方志地图来源于影印出版的明代方志，因此也存在较多先天不足，如收录范围有限、清晰度不足等。

另外，近年来出版了一批中国古旧地图的集成汇编类著作，如《中国古地图辑录》^①、《中国古代府州县舆图集成》^②、《浙江古旧地图》^③、《杭州古旧地图集》^④、《湖州古旧地图集》^⑤、《重庆古旧地图研究》^⑥、《温州古旧地图集》^⑦、《杭州都图地图集》^⑧、《常州古地图集》^⑨等，亦收录有较多方志地图。

有感于旧方志地图的重要价值及旧方志地图利用的不便，李诚提出“在方志目录各项之下，加上舆图名称及其在方志中的位置”^⑩的方志地图目录编制建议，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 旧方志地图研究展望

以上研究成果让我们对旧方志地图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学术界对于旧方志地图“既粗糙又无图例、比例尺，参考价值甚低”的印象。但从总体上讲，旧方志地图研究与“绘本地图（集）和重要的刻本地图集”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下几点或可作为将来旧方志地图研究的方向。

（一）旧方志地图的分区域整理与研究。编目和著录工作是对旧方志地图利用和研究的基础，其中包含对方志地图的版本、数量、类型、作者、位置等基本信息的整理，这些工作相对不足。^⑪汪前进较早着手对4部典籍中的地图进行初步梳理，并对这些地图的功能进行总结^⑫；成一农对5套四库系列丛书中收录的5000余幅地图进行梳理，并总结它们的发展脉络、源流关系和价值，认为对它们进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整理编目等基础性工作^⑬，他们的工作为旧方志地图的整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据不完全统计，仅清代浙江、福建（包含台湾）、广东（包含海南与广西沿海地区）三省现存沿海地区的338种方志就附有地图3300余幅^⑭，现存的8000余种方志中所附地图自不遑言，旧方志地图的整理编目存在较大困难。首先，相对于4部典籍，旧方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收藏分散，并没有一处馆藏机构或者一套丛刊能够容纳下现存全部的旧方志；其次，现有方志目录甚至是权威的方志目录也有较多缺陷与不足，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其进行辨别与考证；再次，地图在方志中分布位置不一，需要仔细爬梳，否则容易遗漏。旧方志地图

① 参见王自强等：《中国古地图辑录》，星球地图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见《中国古代府州县舆图集成》编委会主编：《中国古代府州县舆图集成》，线装书局，2012年。

③ 参见杭州市档案馆：《浙江古旧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

④ 参见杭州市档案馆：《杭州古旧地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⑤ 参见刘宏伟：《湖州古旧地图集》，中华书局，2009年。

⑥ 参见蓝勇：《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 参见钟翀：《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⑧ 参见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都图地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⑨ 参见常州图书馆编：《常州古地图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

⑩ 李诚：《关于编写方志舆图目录的建议》，张英聘主编：《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会年会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909页。

⑪ 参见潘晟：《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

⑫ 参见汪前进：《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

⑬ 参见成一农：《尚待挖掘的常见“新史料”——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成一农：《中国古代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⑭ 参见何沛东：《清代浙闽粤三省方志海图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的编目与著录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区域为单位的方志地图数量较为适中,一些地区的旧方志整理工作已经较为完备,因此现阶段按区域对其进行编目与著录较为可行。

方志及方志地图本身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于风军、龚纓晏分别对陕西省、象山县的旧方志地图进行整理和研究,为开展区域方志地图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示范,但相对于全国的30余个省级行政单位、1600余个县级行政单位来讲则显得不足。^①再者,与旧方志地图的整理类似,对于数量庞大的旧方志地图进行整体研究比较困难,分区域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黄义军认为“地图学史研究往往存在以偏概全,忽视区域(包括区域本身的特性以及王朝对区域的认知与态度等)、社群、族性等维度的现象。基于此,针对某一具体区域的制图史研究值得提倡,因为只有积累扎实的个案研究,才能对一个时代、一个较大地域的地图绘制历史做出概括,进而揭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内在特点及演进规律”^②。相较于其他古旧地图留存、收藏和发现的不确定性,一定区域内的旧方志地图相对容易进行整体研究,对区域旧方志地图进行研究进而探求旧方志地图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规律是研究旧方志地图的较佳路径。

(二)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与使用。潘晟较早对旧方志地图的作者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初步解答了方志地图的作者身份等问题,在之后的旧方志地图研究中,方志地图的作者也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对于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和使用等问题则少有学者问津。旧方志中对于地图的描述多用类似于“事非图不显,图非说不明”^③等语,而宋代陈襄在《州县提纲》中也承认,“方志地图作为信息的来源是有限度的”^④,那么“绘制粗糙”“内容简单”的旧方志地图究竟是谁在阅读和使用?读者者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方志地图?如何利用?方志地图对他们又有何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关乎到旧方志地图的性质和价值判定,是旧方志地图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旧方志地图与其他古地图对比研究。现阶段学界对于旧方志地图的研究与看法多是就旧方志地图自身绘法与内容等展开,那么旧方志地图的“绘制粗糙”“内容简单”的参照对象是什么?旧方志地图与同时期其他地图关系如何?每个时段或者不同地区的旧方志地图在绘制方法、内容选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如清中期之前的旧方志地图对“计里画方”的绘法使用较少,清中期以后开始较多使用“计里画方”之法,是否可以凭借一部或几部方志中的地图来说明所谓“国家舆图”与方志地图之间的关系^⑤,这些问题均需要重新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对同时期同区域旧方志地图与其他古旧地图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在绘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探究造成如此差异的历史背景和因素,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地图学史的视野去审视旧方志地图的发展,进而明晰旧方志地图的价值和旧方志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

(四)学术研究中旧方志地图的利用。近来,华林甫提出“舆图也是史料”的观点,指出“舆图是科学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舆图研究成果也确实以自然科学史界为主。……有些舆图是研究历史事件的绝佳史料,与文字史料一样不可轻视”^⑥。从本质上讲,这不是对古旧地图作用进

① 这里的区域不一定是行政区域,亦可为高原、盆地等自然区域。

② 黄义军:《旧方志中的象山地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4日,第8版。

③ 光绪《广平府志》卷首《凡例》,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④ [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⑤ 参见刘再聪、李亚栋:《“图”“画”说史:方志地图与国家舆图绘制方法的分流及回流——以〈安西采访底本〉附图为中心》,《西夏研究》2014年第1期。

⑥ 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行扩展,而是倡导其本身价值的回归。旧方志地图有数量大、内容丰富、连续性强、分布广泛、体系完整等特点,且容易获取,可成为历史研究及其他研究的重要资料。抛却对旧方志地图的偏见,以旧方志地图为关键或辅助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城市史、海洋史、环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或可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成绩。

结 语

随着地图学史研究的深入,李孝聪、唐晓峰、余定国、成一农等对传统中国古旧地图研究注重科技进步等因素提出不同看法,提倡发掘中国古旧地图自身的发展路径、文化传统和价值^①,旧方志地图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发掘旧方志地图的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契机。现阶段旧方志地图研究虽然呈现出多样性和交叉性等趋势,却偏重于某些领域的个案研究和利用,如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旧方志地图的基础性整理工作及其地位、性质、整体特征的宏观把握等显得不足。笔者认为,对旧方志地图进行研究应加强分区域整理,并与同时期同区域的其他地图进行对比和互证研究,探索旧方志地图的特性和作用,明确其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的地位,为其他多种学科利用旧方志地图提供事实保障;同时需注重旧方志地图人文价值等方面的发掘,从而实现旧方志地图的多重视角、多种学科研究和利用的相对均衡。

另外,方志地图作为方志的组成部分,受到作为载体的地方志的性质、编修目的、刻印技术等方面影响,具有自身特点和较强的“务实性”,看似“先进”的绘法也许并不适合当时的方志,可能给绘图和刻印增加难度,给阅图者也造成阅读障碍。如清代一些方志编修者认为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相对“精确”的地图并不适合方志表现其内容和意图,光绪《嘉兴府志》修志者在绘图时摒弃之前道光《嘉兴府志》地图中采用的“计里画方”之法,转而继续采用“形象示意”画法,并言道“惟旧图开方计里,虽上按度数,然于水利形势仍简略,与其以地舆之近切,转求之高远之天辰,而徬徨难稽,不如就山川城郭、市镇、乡里之确有可凭者,胪列而指明之,尤瞭然在目之为愈也”^②。因此,研究方志地图时,也要关注地方志本身的性质和特征。

侯仁之曾讲过:“由于那些古旧地图多出自当时人之手,保存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往往给后世的研究者以意想不到的启迪。”^③甄别和剥开旧方志地图“粗糙”“不科学”的外衣,在丰富的历史信息中探寻它们的独特性和价值及“意想不到的启迪”,从而彰显方志“征古以式今,亦继今以接古”^④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中国学术》2000年第4期;〔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成一农:《“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② 光绪《嘉兴府志》卷1《图说·嘉兴府总图说》,光绪五年(1879)刻本。

③ 侯仁之:《序》,李孝聪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页。

④ 康熙《鄞县志》卷首王揆《鄞县志序》,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